

制度演化与国家治理视角下中式会计变迁的经济学透视

梁晋敏

南宁学院

DOI:10.12238/ej.v8i10.2968

[摘要] 会计不是孤立的“技术活”,而是嵌入在特定经济结构、制度禀赋与文化传统中的“基础设施”。当19世纪中叶中国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后,传统经济面对资本、价格、风险等全新变量,旧有记账方式的信息容量与契约执行功能迅速枯竭。本文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式会计的嬗变为主线,借助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财政社会学的分析框架,阐释会计制度演化背后的经济逻辑:第一,说明小农经济向近代市场经济过渡中,信息需求升级如何诱致制度变迁;第二,揭示传统簿记与西式复式簿记之间的路径依赖、学习成本及本土化调适;第三,评估会计改革对国家财政能力、金融深化与产权保护的溢出效应;最后,在“全球化—本土化”张力下总结可供今日制度移植参考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 中式会计; 制度演化; 路径依赖

中图分类号: F23 **文献标识码:** A

Economic perspective of Chinese accounting chan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evolution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Jinmin Liang

Nanning University

[Abstract] Accounting is not an isolated "technical work", but rather an "infrastructure" embedded in specific economic structures, institutional endowments,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When China was drawn into the world market system in the mid-19th century, traditional economies faced new variables such as capital, prices, and risks, leading to the rapid depletion of information capacity and contractual enforcement functions of old accounting method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accounting from the late 19th to early 20th century, using analytical frameworks from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Fiscal Sociology to elucidate the economic logic behind the evolution of accounting systems: First, it explains how upgraded information demands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smallholder economy to modern market economy induced institutional changes; Second, it reveals path dependence, learning costs, and localization adaptations between traditional bookkeeping and Western double-entry bookkeeping; Third, it evaluates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accounting reforms on national fiscal capacity, financial deepening, and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Finally, under the tension of "globalization-localization", it summarizes lessons for contemporary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ation.

[Key words] Chinese accounting;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Path dependence

会计制度是观测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窗口。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前期,在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与中国内生变革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会计体系经历了从传统簿记向现代会计的历史性转型。这一过程既展现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特征,也体现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求,通过观察这一会计制度转型的过程,可以为如何在因外部环境日益开放而带来的冲击中形塑各项制度提供有益镜鉴。

1 传统簿记的经济嵌入性:小农—行会经济下的低维度信息

马克思指出会计是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从这一思想可以看出,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已经随着其所处年代剧烈的产业技术革命而不断提高,不仅仅是对“实物存量”的反映,更要求通过“过程的控制和观念的总结”来达到为资本价值增殖服务的目的。

但19世纪末期的中国处于从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的转型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方世界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经济特征与信息需求方面,仍旧以分散的小农生产、地方性行会商业为主,交易半径短、资本周转慢、不确定性低。经济主体更关心“实物存量”而非“资本增值”,对会计的核心需求是“对数”与“对物”,而非“对风险”与“对资本市场”。由此演化出的中式簿记——单式流水、龙门账、四脚账——在信息维度上呈现“进-缴/存-该”二维结构,足以支持小范围合伙或家族经营的监督与分红。

制度均衡与低水平锁定表现为,根据诺斯“制度—组织共生”理论,当经济规模与竞争程度未突破临界阈值,传统中式簿记与传统经济之间形成低水平均衡:行会内部通过关系型治理降低契约风险,会计只需提供可观察的“总量”信息;国家财政以“丁随地起”的定额田赋为主,对微观会计并无统一规范诉求;知识群体将簿记视为“吏术”而非“学术”,缺乏创新激励。结果是,即便17世纪山西票号已出现类似复式思想的“龙门合账”,也因缺乏外部市场压力与规模经济而未能内生地演化为现代会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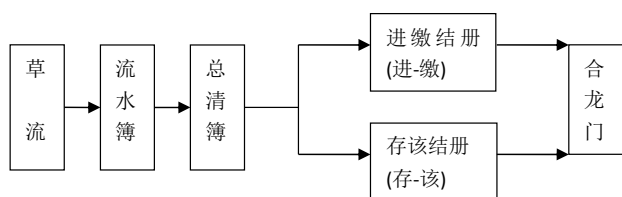


图1 龙门账账务处理程序

2 外力冲击与需求升级: 通商口岸、洋务企业与信息缺口

鸦片战争后,随着《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数量从原先的5个急剧扩张至16个。在这一过程中,外资银行、买办资本与洋务企业共同引入了西方先进的商业模式,包括有限责任制、股份自由转让制度、跨期折旧核算以及汇率损益处理等创新机制。然而,中国传统单式簿记体系无法有效记录和反映“资本—利润—风险”这一现代企业运营的三元信息结构,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后果:其一,由于缺乏准确的财务信息,投资者难以合理评估企业股权价值,导致资本市场融资长期局限于血缘关系和地缘网络;其二,企业因无法提供规范的财务报告而难以获得银行信用支持,长期资金需求不得不依赖钱庄的高息短期拆借;其三,政府因缺乏企业真实经营数据而难以建立现代税基体系,在传统关税与厘金之外难以开拓新的财政收入来源。

根据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当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交易成本超过制度转型所需的边际成本时,制度变迁就会自然发生。19世纪70年代后,这一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充分验证:外资银行率

先拒绝接受中国传统红单作为贷款抵押凭证,这一举措直接抬高了传统簿记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与此同时,通过对西式商业活动及西方世界的实地考察发现,采用西式簿记的企业能够以更低的利率获得外国银行贷款,这种“示范—模仿”效应逐渐形成。在此双重作用下,西式复式簿记在中国社会的认知定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少数人研究的“学问奢侈”蜕变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增长必需品”,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国会计制度现代化进程的正式开启。

3 制度供给的初次尝试: 连环帐谱与知识外溢

1897年问世的《连环帐谱》在引进西方复式簿记时展现了显著的本地化创新智慧。该书并未机械套用意大利的借贷记账法,而是创造性地采用“存-该”这对本土化术语来对应“借-贷”概念,同时巧妙结合了中国传统的竖排书写方式和中文数字系统。这种精心设计的改良方案,实质上为当时中国的账房先生们打造了一个“学习门槛最低”的复式簿记版本。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这种本土化改造显著降低了所谓的“制度翻译成本”,使得源自西方的新知识能够更顺畅地融入中国既有的商业知识体系。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部开风气之先的著作在其出版后的十年间,在商业实践中几乎无人问津。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剖析:首先,在制度环境方面,当时中国缺乏配套的现代商业制度体系——既没有专业的注册会计师队伍,也缺少专门的商事法庭和完善的商法体系,导致做假账的惩罚风险极低;其次,在经济基础方面,股份制企业数量稀少,采用新式簿记带来的边际收益难以覆盖账房人员的学习成本;最后,在文化心理层面,“借/贷”这样的外来术语被传统士人阶层视为“蛮夷符号”,引发了强烈的文化排斥和身份认同焦虑。

这一历史案例生动印证了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即使出现了更先进的技术方

4 国家角色与强制性变迁: 大清银行的“现金收付复式簿记”

1908年,清政府为应对日益严峻的财政金融形势,正式设立大清银行,这一历史性事件标志着中国金融体系首次出现了国家以“最后贷款人”身份介入的制度安排。当时清廷面临着沉重的外债偿付压力与迫切的币制改革需求,度支部亟需建立一套能够实现财务核查、数据汇总且符合国际标准的会计信息系统。为此,清政府特别聘请日本金融顾问团队,引入当时先进的“现金收付复式记账法”,并通过颁布《大清银行则例》等央行章程的形式,在全国金融系统强制推行这一新式会计制度。与蔡锡勇《连环帐谱》所体现的市场自发采纳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形成鲜明对比,这次改革完全符合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中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特征:中央政府凭借其行政权威和公权力,直接将新会计规则植入国家金融体系的核心部门,从而显著降低了整个金融系统制度转换过程中的协调成本和实施阻力。

现金收付复式记账法在技术设计上颇具匠心:它以“现金”作为记账的核心主体,巧妙地规避了中国传统商业会计中“权责发生制”观念缺失的固有缺陷;同时采用直观的“收-付”记账符号取代西方会计中的“借-贷”术语,有效降低了新制度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认知障碍。该记账法独创的试算平衡公式(收方合计必须等于付方合计)为大清银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货币发行监控工具,使央行能够准确掌握准备金状况和货币流通数据,彻底改变了传统中式簿记“只见货物往来、不见资金流动”的信息盲区。这一会计创新不仅为当时正在推进的银本位制度改革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更直接促成了1910年《兑换券则例》的出台,为现代纸币发行制度奠定了坚实的会计基础。

大清银行的会计改革产生了显著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在1909至1911年间,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主要金融机构相继效仿采用新式会计;同时,大批留日归国的财经专业学生将标准化的会计凭证(传票)、科目设置和资产负债表格式引入各省官银钱局,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簿记制度的地域分割状态。在这一过程中,延续数百年的中式“红单”记账法首次出现被边缘化的趋势。尽管辛亥革命的爆发暂时中断了这一会计现代化的进程,但历史数据表明,到民国初年时,“现金收付复式记账法”已经成功取代传统簿记方法,成为当时中国金融部门普遍采用的新标准,实现了诺斯理论中所描述的“制度锁定”效应。

5 民国初年的制度竞争:改良中式簿记与全面西式

进入1920年代,民族资本主义出现“黄金期”,股份公司数量从1912年的20余家增至1926年的近800家。企业规模扩大、股东分散,引发对审计、招股说明书、法定公积金等信息的刚性需求,西式簿记的收益曲线陡升。

徐永祚的“改良中式簿记”保留“收付”符号与账簿外观,引入损益表与资产负债表,试图降低制度转换成本;潘序伦倡导的“全面西式记账”则直接采用借贷法与英文报表,对接国际资本市场。

根据阿西莫格鲁的制度选择模型,当“外部市场”比“内部关系”更重要时,制度将向更透明、更通用的规则收敛。由于民族企业需向外国银行借款、赴沪交易所上市,全面西式方案提供的信息租金更高,最终胜出。1925年《公司条例》强制规定股份公司须提交西式资产负债表,标志制度竞争终结,也意味着传统簿记正式退出主流。

6 会计改革与国家财政能力:一个财政社会学的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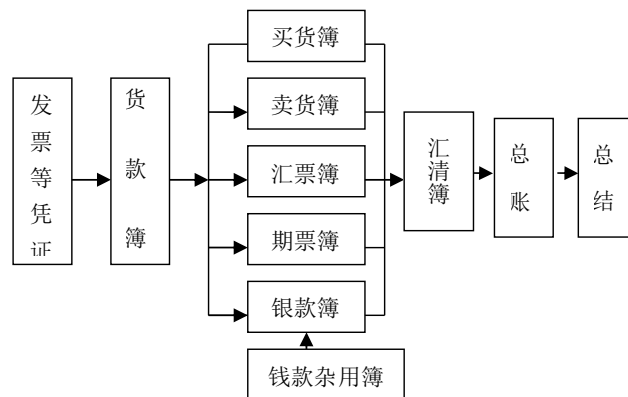


图2 改良中式簿记

西式会计提供了“利润—成本”可核查维度,使政府首次具备对企业盈余征税的技术手段。1930年代营业税、所得税的落地,依赖的正是新式账簿与注册会计师查账报告,国家财政由“地丁—关税”二元结构转向“直接税—间接税”复合结构,财政能力显著增强。

统一会计语言降低了银行间信息摩擦,推动拆借市场利率下降60个基点(据《银行周报》1933年数据)。同时,新式账簿使企业抵押资产透明度提高,中国银行1934年工业抵押贷款余额较1927年增长4.6倍,信用扩张成为民族工业投资增长的重要来源。

会计改革催生了最早的《会计师条例》(1918)与《审计法》(1929),确立了独立审计的法定地位。第三方审计作为“state-auditing”之外的“market-auditing”,填补了国家监督能力的空白,为产权保护提供了互补性制度,体现了“国家—市场—社会”三元治理结构的初步形成。

7 经验教训与当代镜鉴

经验表明,简单移植外来规则若忽视本土知识网络,将因高昂的学习成本与身份贴现而失败;通过“语言转换、符号嫁接、渐进试点”可有效降低阻力。今日引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亦应关注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学习能力,设置梯度实施路径。

会计规则需要与商法、税收、司法、资本市场等互补制度协同演进。当前我国推进“碳会计”“ESG信息披露”,同样需要排放权交易、绿色金融、第三方审计等配套制度同步落地,否则将出现“有准则、无执行”的空中楼阁。

大清银行以央行章程强制推广新簿记,示范而非替代,既打破旧锁定,又留出市场学习空间。今天政府在推动“数字化会计”“区块链发票”时,亦应通过公共平台提供开源标准,允许市场自主迭代,避免行政一刀切造成资源错配。

民国时期盲目照搬西方方案也曾导致“水土不服”,如折旧方法忽视农业季节性、破产条款与宗族伦理冲突等。当前“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会计标准“走出去”须尊重东道国的法律、

税收与文化差异,推动“对接—融合”而非“替代—覆盖”,才能真正提升制度软实力。

8 结语

从传统“收付存该”到现代“借贷复式”,清末民初的会计变迁不仅是一次技术升级,更是中国由小农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制度缩影。它揭示了经济形态变化→信息需求升级→制度供给响应→国家能力增强的完整链条,也验证了“制度演化一路径依赖—互补协同”的经济逻辑。回望百年,我们得以确认:会计绝非冷冰冰的分录,而是塑造市场信任、拓展财政边界、连接国家治理与全球网络的微观基础设施。今日中国面临数字经济、绿色转型与全球治理新议题,会计制度仍需在本土化与国际惯例之间保持创造性平衡,方能持续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可信、可用、

可比较的信息基石。

[参考文献]

[1]郭道扬,谭超.《中国会计通史》导论[J].会计与经济研究,2022,36(01):3-26.
[2]王思媛.中国会计发展史[J].现代营销(经营版),2020,(10):168-169.
[3]李家瑗.中国会计发展史采撷[J].广西财政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02):36-40.

作者简介:

梁晋敏(1990--),男,壮族,广西防城港人,研究生,管理学硕士,中级会计师,从事工作为高校教学。